

#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民俗文化发展及其动力考察

## ——以佛山醒狮为例

谢中元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岭南文化研究院,广东 佛山 528000)

**摘 要:**与城镇化、全球化发展影响下民俗传统整体趋于溃散的情势不同,佛山醒狮适应社会变迁并走出了具有样本意义的发展之路。这归因于上世纪 80 年代民间醒狮的复兴及其从民俗到体育的重构,进而实现了 90 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中醒狮的竞技化、非遗保护情境下醒狮的文化再认同及其联动。依托文献记载和口述访谈,在“国家/社会”框架下阐述其动力机制,有助于透视地方民俗文化发展规律,并为狮舞类非遗的可持续传承提供路径参照。

**关键词:**地方民俗文化发展;佛山醒狮;地方社会;动力机制

**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9)06-0028-08

我国舞狮分北派舞狮(北狮)和南派舞狮(南狮)。广东醒狮作为北狮南传并本土化的南狮代表,主要活跃于粤港澳并传布于海外华人社区。佛山则是广东醒狮最核心的分布地之一,被普遍认为是南狮起源地。民俗学家叶春生直言:“岭南舞狮,以佛山为最有名……岭南狮头的制作,也是以佛山为最著名。”<sup>[1]</sup>改革开放带动了地方民俗发展的深刻转型,在民俗传统整体趋向溃散的情势下,佛山醒狮适应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并发生了颇具代表性的调适与革新。2006 年,由佛山、广州、遂溪等地申报的“广东醒狮”,经国务院批准,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佛山也因醒狮文化丰富、醒狮运动繁盛,于 2009 年获得国内首个“中国龙舟龙狮运动名城”称号,其所属多个区镇也获得龙狮名城、龙狮名镇等称号。这显示了佛山醒狮以国家、地方社会互动为动力机制,在城镇化、全球化中自我调适、寻求发展的存续轨迹,蕴含着地方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深层结构。

### 一、改革开放后醒狮从复兴到规模化与体育化

#### (一)习性苏醒与民间醒狮复兴

舞狮原本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革”时期民间舞狮被抑制和禁止,但这不可能抹除根植于民众身体的记忆和技艺。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传统的地方文体活动以隐性方式复活。这种“复活”并非“突然降生”,而是沉睡中渐进式苏醒和解封的过程,其全面复兴则始于改革开放。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文艺、文化事业实施“拨乱反正”的政策,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sup>[2](P213)</sup>,文化艺术重新走向“百花齐放”的自律发展之路。1981 年,中共中央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关于群众文化建设的文件《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强调“要支持那些成为民族风俗习惯、历史

收稿日期:2019-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改进设计研究”(17ZDA16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学研究”(18JZD019);佛山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1949~1976 年佛山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2019-QN06)

作者简介:谢中元(1979-),男,湖北宜昌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传统的节日欢庆活动”,而这在1982年12月颁布的《宪法》中得到彻底合法化。

改革开放后,佛山依赖工商业优势基础,成为广东省内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发财致富”不是讳莫如深的名词,而是佛山民众光明正大的现实目标。叶春生所描述的情形与之契合,“南方的狮子则穿街走巷、挨家挨户去给人们拜年贺喜,以示瑞狮临门、吉祥如意。”<sup>[1]</sup>舞狮采青意在祈福求财,本就是包蕴着民众世俗需要,被佛山民间共享和认同的仪式性民俗,契合了经济建设时代民众向往发财致富的主旋律。舞狮同样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这反过来吸引了更多的民众加入舞狮行列。笔者所访谈过的舞狮人多将上世纪80年代当作醒狮发展的黄金时代,印证了改革开放以后佛山醒狮的全面复兴之况。老一辈舞狮人罗荣强回忆:“改革开放嘛,一放开就百花齐放了,遇到节假日、商号开业,我就带领狮队去助兴,舞狮采青忙不过来。有些人成立狮馆,有些人设立武馆,这一行的热情调动起来了。我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机会也多了,凭我玩狮子、玩武术的天分、阅历、见识、经验,还到处给人讲课,教舞狮,教功夫,政府鼓励呀。”<sup>①</sup>舞狮人的切身体验和记忆,存储了佛山醒狮复兴的鲜活图景。

佛山城镇的职工舞狮队也应运而生,80年代前期,“佛山、石湾职工也喜爱民间体育活动,很多基层工会都有醒狮队”<sup>②</sup>。擅长舞狮之人在解禁的新环境中如同鱼归于水,迎来了个人舞狮生涯的春天。有实力的舞狮人甚至有机会跨出国界传授武术和狮艺。“1985年,另一名武术好手梁东升应毛里求斯华侨组织南顺会馆的邀请,前往传授武术和舞狮技艺。”<sup>③</sup>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使民众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互助要求,聚族而居的同宗亲之间的互助联动增多。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村民主建设,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华侨返乡,也加速了宗族的复兴过程,带来了修祠堂、修族谱、同族祭祀等宗族活动的复兴。醒狮成为民众生产劳作之余的主要活动和娱乐方式之一,乡镇村落内部之间的联系因舞狮而得到凝聚和加强。舞狮人在长期公开的表演生活中,形成了有别于纯粹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状态,在兼顾

私人生活和公共工作的过程中普及、传承了舞狮技艺。

舞狮能在佛山全面恢复,政策的宽松是其外在原因,内因在于,佛山民众本就具备热衷且擅长舞狮的“习性”。在布尔迪厄看来,“习性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sup>[3](P80)</sup>,具有不因外在环境条件改变而轻易变更甚至消失的特点。当然,他也承认客观环境之于习性的作用力以及二者存在互动关系,即客观环境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导向作用。同一族群或地域的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习性,只要外在环境的限制解除,人心深处基于集体共享的“习性”就会恢复活力,促使群体成员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资源作出共通的行为选择,这正是改革开放后佛山醒狮迅速复兴的社会心理依据。

## (二)文化政策引导下醒狮的规模化

改革开放之后,从国家到地方都注重加强对民间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引导。自上而下的政策带来了切实的效果,广东省内曾经溃散凋零的各级体委、文化馆、文化站等民间文化、体育管理机构得以建立和完善。据调查,“1983年以来,全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区、镇建立了文化站,建立了500多个农村集镇文化中心,把体育纳为一项经常性活动内容。”<sup>[4]</sup>文化站作为农村文化体育活动中心,一般都把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列为经常性内容,在舞狮文化发展中充当着组织者、支持者和参与者的角色。

舞狮成为体育社会化发展的载体,以星火燎原之势进一步普及,以至于“80年代舞狮活动进入有组织、有规模的活跃年代”<sup>[5](P196)</sup>。1982年11月27日,佛山恢复举行大型秋色赛会,舞狮是其中的主要参演项目之一,笔者所访谈的诸多老师傅都曾受邀参加。即便在相对偏远的高明区杨梅镇(时称“杨梅公社”),也举办过大型、公开的舞狮活动。《高明文史》载:“1982年,杨梅公社还组织了一次醒狮表演,来自全公社十个大队的40多头醒狮参加了比赛,表演醒狮采青的套路有地青、高青、凳青、盆青、蟹青、桩上青等,观看表演的有4500多人。”<sup>④</sup>这意味着舞狮在新的文化、体育管理机构的牵引下,成为大型公

① 受访人:罗荣强;时间:2017年8月13日上午;地点:佛山禅城卖鱼强功夫鱼宴。

② 佛山市总工会:《佛山工会志1921~1985年》,内部编印,1989年版,第48页。

③ 陈玮:《南海县的武术和舞狮》,南海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海文史资料(20)》,内部编印,1992年版,第64页。

④ 冯坚华:《杨梅镇的群众体育活动》,高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高明文史(11)》,内部编印,1997年版,第243页。

共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政策,离不开精英人物的参与。参与推进南海醒狮复兴的关润雄,正是此类人物的代表。他生于南海,自小跟随父亲关养暖练习洪拳,学习舞狮,而且师承彭南、马齐、马国辉等老师傅,学习咏春拳、龙形拳,后来毕业于南海体校,这使他在醒狮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关润雄口述,“1981年,我调到了南海体委,那时候开始可以慢慢地恢复传统项目了,我那时是负责群体项目的嘛,第一个推舞狮、武术和龙舟三个项目,当时就发文件到各个公社,要求建立武馆,恢复醒狮项目。那时节日庆典的时候就搞舞狮表演,那时还没有比赛,只有表演。搞了两年以后,我就觉得有些不对了,很多人都不敢出来,黑教头的、黑师傅的、武馆的跌打医师都不敢出来。那时候我就搞武术、舞狮培训班,把武馆、文化站并在一起,这是镇级的,然后由各村啊、乡啊来推荐,当时我成立了南海武术龙狮协会,我当了协会主席,然后把各个武馆的教头全都编进我的协会里面,目的是把大家凑起来一起来研究和探讨。”<sup>[6]</sup>这正是费孝通在讨论中国农村现代化时所强调的,“把人才渗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地方自治事务中去”<sup>[7](P396)</sup>的一个典范。在地方精英的推动、组织和协调下,官方和民间的互动之势在龙狮武术领域迅速形成。

### (三)醒狮重构:从民俗趋向体育

舞狮历来是民众用以娱神、自娱与娱人的民间活动,“民国22年,(南海)县政府成立体育委员会并指定常务委员,开始把体育工作列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政府大抵主管近代体育运动的开展。民间传统体育,仍沿旧习”<sup>[8](P1155)</sup>。舞狮属于此处所指的“民间传统体育”,只能在民俗“旧习”范围内延续。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农村体育的引导和扶持逐渐显现,198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1984年,国家体委发布《关于加强县体育工作的意见》,从政策上对于农村体育的发展指出了方向。通过规则制定、比赛切磋、技艺共享等途径,舞狮活动体育化、运动化,成为革新醒狮的首要考虑。

关润雄回忆了编写舞狮比赛规则的经历,“其实我在82年的时候就开始搞这个规则了,真正编出来和使用是在84年。那时在官窑搞了一个表演赛,还

不叫比赛,叫表演赛,然后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让每一支队伍都有奖,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sup>[6]</sup>。经过前期的筹备,真正将舞狮变为竞技比赛项目,始于南海县1986年运动会,“1986年起增加醒狮武术赛”<sup>[8](P1155)</sup>。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1986~1987年,县体委、县武协举办舞狮、武术比赛,里水、官窑、平洲、九江、大沥、西樵、和顺、沙头等地也举办同类镇级比赛。舞狮比赛按规定的时间和内容进行。”<sup>①</sup>另据《南海市体育志:1979~2002》载:“(1987年)1月20日,南海县首届醒狮武术比赛在和顺举行。11个镇派队参加,大沥、平洲分获团队总分冠亚军。”<sup>[9](P6)</sup>舞狮比赛带动了城乡基层舞狮组织和舞狮人的热情,基层镇街也普遍接受竞技观念并将舞狮变为赛事。

这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体育运动的整体复兴相关。1989~1997年南海举办的三届市(县)运动会均将醒狮列为比赛项目,其中,1989年第三届县运动会于10月1日至15日在新落成的县体育场举行,17个镇、21个代表团、2793个运动员及裁判人员参加,全国人大常委霍英东、全国政协委员石景宜、佛山市委书记叶谷、省体委副主任董良田、省体育总会副主席曾昭胜等出席。1993年第四届市运动会、1997年第五届市运动会,分别有运动员3326人、3384人参赛。在三届南海运动会的醒狮比赛中,各镇街舞狮技术实力旗鼓相当,均有不俗的表现,这说明舞狮的活动是有一定普及面的。地方政府部门开展舞狮比赛,旨在获得“体育先进县”等地方政绩;对舞狮个体来说,参与舞狮比赛则可以获得实际的荣誉回报。

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为舞狮的整合式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乡镇企业认识到舞狮对企业文化发展的作用,因而出现了乡镇企业组建狮队的现象。《佛山市城区志》载:“80年代,(佛山)城区已有60多个龙狮队,其中以佛山市第二运输公司、佛山乐器厂、佛山纸箱厂的龙狮队阵容最齐。”<sup>[10](P680)</sup>另据《南海市体育志》载:“1989年,平洲电镀厂工会醒狮队成立。次年11月7日,佛山市人民政府代表团赴日本友好城市伊丹市访问,该厂工人醒狮队随团访问表演。1992年4月27日,平洲电镀厂工人醒狮队受国家体委委派,随中国武术队赴泰国,作为友好使者参加泰国皇后60诞辰庆祝活动。”<sup>[9](P41)</sup>这些依托企

① 陈玮:《南海县的武术和舞狮》,南海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海文史资料(20)》,内部编印,1992年版第63~64页。



业而成立的狮队不再是那种仅仅自娱自乐的舞狮团体,而是通过参加比赛、公开演出确立自己在赛事榜单上的位置,借以宣传企业的产品和形象,提升企业职工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的扩展,位于城市边缘地区的乡村进一步城市化,这类区域多地处城乡结合部,在各类乡镇企业的支撑下,从市郊农村社区变为边缘城市社区,其经济活动也从以农业性为主转变为以非农业性为主。乡镇企业发展为农村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主要支柱,经济结构从过去以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为主体逐渐向以工业为主的工、商、建、运、服等多业并举转变。舞狮的主体不再是纯粹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而是职业化的劳动者。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佛山整体经济的发展,让地方对舞狮比赛有足够的财力投入。举办、参加舞狮比赛,可以对外宣传地方形象和展示地方实力,这是地方力推舞狮比赛的动力所在。

## 二、1990年以来醒狮的竞技化与文化再认同

### (一)全球化与醒狮的竞技化

佛山醒狮所处的已不再是局囿于岭南一隅的乡土环境,而是以流动、交流、变迁和互动为特征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场景。费孝通曾对上世纪90年代末期时代总体特征做过如下判断:“展望21世纪,我依稀看到,20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中更新自身的使命。我做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根据的。近二三年来,我特别关注区域发展过程中全球化的力量。”<sup>[11]</sup>这种“全球化的力量”并不是无形的存在,已通过各种迹象显现出来。

对地方舞狮而言,运动化、体育化、竞技化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表征,而组织的全球化使得来自不同地域的舞狮有了交流、较量的联络中介,使地方舞狮跨出地方,走向世界,而其所具备的民俗性、地域性在舞狮成为世界性运动的过程中逐步祛魅。如汤姆林森所言:“全球化(globalization)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sup>[12](P1)</sup>舞狮组织全球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国际龙狮运动协会于1995年1月23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国龙狮运动协会同年也在北京成立,舞狮运动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实际上,在这个时间段内,亚洲龙狮运动联合会、部分省市龙狮运动协

会也相继成立或组建。地方舞狮的全球化,在各级龙狮组织制定规则、举办比赛、宣传推广的纷繁实践中显出雏形。1994~1995年,国家体委首次制定龙狮运动竞赛试行规则并组织了龙狮裁判员培训,在上海举办了首届国际龙狮邀请赛,在广州举办了首届全国龙狮锦标赛。国家层面的规则制定和赛事策划,标志着舞狮正式成为竞技体育运动项目,此后更将国际、国家级的舞狮赛事常态化,逐渐形成了一个国内外互动的舞狮竞技网络体系。

事实上,佛山也引领了国内舞狮的竞技化发展。自1990年南海县醒狮队首次跨出国界,在吉隆坡举办的马来西亚武术节醒狮赛中获得特优奖以来,佛山的醒狮队伍相继在国际、全国性的龙狮邀请赛、大奖赛、锦标赛、争霸赛等舞狮赛事中亮相夺奖。其中,1994年5月,南海大沥醒狮队在广东省首届武术醒狮大赛中夺得冠军;1996年3月,由南海市政协主席关性乔带领的南海醒狮队在比利时举行的第三届欧亚国际醒狮赛中夺得首个国际赛冠军。1985~2002年,佛山南海龙狮队在国际性龙狮大赛中14次夺冠,南海龙狮跻身世界劲旅;2002年10月,南海被中国龙狮运动协会授予“中国龙狮运动之乡”称号。国内外的舞狮比赛给佛山醒狮提供了广阔的展演空间,让地方政府、企业发现了醒狮文化蕴藏的多维价值。

从1996年编印的《南海雄风——舞狮套路精选》可以看出意味深长的信号。在这本未公开出版的印刷物中,出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的题词“友谊长存”,广东省省长的题词“中国南海醒狮”,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的题词“弘扬醒狮文化,振兴南海经济”,中国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亚洲武术联合会名誉主席徐才的题词“东方醒狮,中华国粹”,国际龙狮总会会长梁深棠的题词“大发狮威”,国际龙狮总会主席欧绍永的题词“狮吼雄风”,广东省体委主任董良田的题词“推广南国醒狮,实施全民健身”,马来西亚龙狮会主席黄国华的题词“龙狮外交,增进情谊”以及香港等地龙狮团的题词。高层官员的题词出现“文化”“国粹”“健身”“经济”“外交”等关键词,昭示了国家和地方对醒狮文化的基本态度。

在此背景下,佛山醒狮的发展显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发展,而是处于国家、地方社会、全球化等力量在场的共谋和协商中,从民众主体自我享用的文化成为“他者”共享和大众消费的文化,从民众生活的原生空间“脱域”并“嵌入”由公开竞技、市场消

费、域际共享等构成的跨地区、跨族群、跨文化的公共场域,成为集地方名片和国族象征为一体的特色文化符号。为顺应地方振兴和发展需求,佛山醒狮作为特色文化资源,被卷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商互动逻辑当中。由此,政府部门乐于支持,企业资本趁势进入,基层民众主动参与,各方力量借力舞狮,或策划赛事,或组织活动,或开发旅游,无非是在将醒狮资源化和资本化,从根本上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1996年,黄飞鸿狮艺武术馆在黄飞鸿故乡西樵禄舟村建成,依托黄飞鸿狮艺、武术助力西樵山旅游发展。1999年10月,南海中联电缆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有泉出资组建“黄飞鸿中联龙狮团”,该龙狮团作为国内第一个由非公有制企业兴办的专业化、职业化龙狮团,在土地、政策等方面均得到当地政府的扶持,可谓以商为主、政商合力的结果。

乡镇企业以及企业主持续注资醒狮竞技化发展,也成为世纪之交佛山醒狮进一步转型的动力。2000年张槎莲塘民营企业陈锦桃投入35万元人民币,在张槎文化中心创办“富威龙狮武术健身会”;2001年鹰牌控股有限公司、东鹏陶瓷集团公司、佛山农村信用合作社分别以4万元、3万元、3.6万元人民币资助石湾第四届运动会;2001年、2002年澜石季华铝材厂分别以15万元、25万元人民币资助佛山龙狮运动协会举办了“季华铝业杯”南粤狮王之王争霸赛、“季华铝业杯”广东省第三届龙狮争霸赛;2002年鹰牌控股有限公司资助40万元,协助石湾区人民政府举办了“鹰牌陶瓷杯”中国首届粤港澳台狮王争霸赛<sup>[13](P796)</sup>。这些在社会资本资助下举办的醒狮竞赛,无一例外都是趋于规范化、标准化的高难度高桩狮赛。佛山民间自办、自管、自娱、自练的舞狮活动,在这股醒狮竞技化的时代潮流中发生了从表演形态到技术体系的变迁,其动作、技术、器械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

## (二)非遗申报与醒狮文化再认同

2005年中国启动实施非遗保护,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非遗保护原则,非遗保护正式嵌入地方社会。佛山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关宏回忆:“刚刚起步就遇到8月的申报。局里心急如火地召开了专家以及资深文化工作者的会议。由副局长廖之春主持会议,传达上级任

务,要将佛山已经尘封或濒危的贵重珍宝挖掘或抢救出来,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一算时间,只有20天,就要定下项目,写出材料,申报上去。廖副局长的动员充满激情,情不自禁地透着急切的心情。于是,工作人员立即行动起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共选出佛山传统文化项目十几项,来不及反复论证,决定先选送7个项目:粤剧、石湾公仔、佛山醒狮、佛山剪纸、龙舟说唱、佛山秋色和祖庙三月三北帝诞。”<sup>[14](P16)</sup>2005年12月31日,《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告》正式发布,由佛山、广州、遂溪等地申报的广东醒狮作为传统舞蹈类项目,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名录。

非遗保护是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号令中实施的,本质上“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下的一种传统文化知识再生产,是以政府、学者、社会三方为主,多方共同参与的学术、政治实践与文化运动”<sup>[15]</sup>。它的介入在于推行了一个关于认知文化多样性以及重新认识传统的理念。不管是狮队负责人,还是普通队员,都表达了“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醒狮不是竞技而是文化”“传承醒狮文化的使命更重了”的看法。梁伟永师傅曾如此表述:“个人体会吧,以前舞狮是一个武馆的招牌,是武馆的代表,一个武馆如果没有醒狮,是出不了名的,那时候醒狮基本上以武术、武馆的理念发展。慢慢的,新派狮传到佛山,在传统狮基础上加上技术、艺术,传统狮没了市场。80年代后,舞狮又开始兴起,很多单位开张会请醒狮表演,慢慢的,醒狮就趋向于这方面。近十年,政府重视醒狮,传统狮重新流行。去年在香港,指定我们玩传统狮。政府意识到醒狮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到醒狮对于和谐社会发展的益处,给予了醒狮比较多的鼓励与支持。”<sup>①</sup>非遗保护使得传承者对于醒狮文化属性的认知逐渐清晰,为传承者提供了为自持文化正名的机会。

竞技体育规则通过厘定器械标准、套路程序和动作难度,对醒狮表演进行了技术上的量化规训。非遗保护的推进,使得舞狮界对于传统醒狮文化的自觉自信被激发起来,挖掘传统醒狮套路、举办传统舞狮赛,成为舞狮人的共识。在访谈中,凡是被列为代表性传承人的舞狮人都会提及,传统狮艺要求马

① 受访人:梁伟永;时间:2017年7月15日;地点:佛山鸿胜馆何祥武术同学总会鸿胜梁馆。

步、腰力、手力、脑力、鼓乐配合默契,狮子滚绣球、蟹青、盘凳青、高青、蛇青等套路濒临失传。实际上,传承者看到了醒狮体育竞技之外的另一面,这正是醒狮作为非遗的深层质素。在醒狮非遗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从2008年开始佛山积极举办传统舞狮竞赛。南海区首届传统狮锦标赛于2017年2月19日在桂城举行,来自南海各镇街的42路狮队齐聚桂城万科广场,分地青和台凳青两个项目。

从传承人、传承基地到政府主管部门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在醒狮发展中的价值与作用。这些转向醒狮传统、回归传统舞狮竞赛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在醒狮表演中“还原”文化内涵的努力,反映了传承主体在非遗保护话语影响下对于“历史本真性”的再发现、对于地方醒狮传统的再认同。因为“由外界进入的非遗保护行为,实际上是使传统文化从自在的迷失状态转向客体化——成为更大范围公众认知和接受的对象。与此同时,这种客体化对于继承者群体来说成为一种镜像体验:从他者的意象表达中反观自身,通过镜像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sup>[16]</sup>。这些基于文化主体意识而产生的实践,已体现了基层政府、社区、传承人等对于醒狮传承和保护自觉。

通过国家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推举、策划和开发,原本被地方民众所创造和共享的醒狮被遗产化,“‘遗产化’过程并非如此简单、机械与平滑,它无法脱离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矩阵,更无法摆脱个体、机构、文化群体、族群、国家等遗产主体的牵涉”<sup>[17]</sup>。醒狮遗产化的本质是资源化,这使醒狮从边缘步入中心,在价值、地位上迅速提升。而地方社会主动迎合、接纳甚至主动谋划醒狮文化的资源化实践,将醒狮的“外价值”托举到更加凸显的位置。醒狮不再仅仅是水乡村落中慰藉心灵、娱神祈福的原始娱乐,而成为塑造地方形象、累积地方口碑的文化资源和象征资本。这个过程客观上带来了传统醒狮的复兴,以及民众对于所持有传统醒狮的自珍和再认同,使得传统醒狮与标准化、职业化的竞技南狮共同得到发展。

### 三、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醒狮发展的动力机制

“国家/社会”在历史人类学等研究领域是一个较为成熟的表述与分析模式,以研究华南区域社会为对象的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以及主要研究华北区域社会文化的赵世瑜、高丙

中等海内外学者对此多有阐发。他们在宗族、市场、民间信仰等领域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特别是借鉴桑格瑞、王斯福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以民间信仰等为案例探讨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研究揭示出民俗文化不只是外在的经验事实或观念认知,它们作为形式上的“中间场域”,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相渗透、碰撞不可缺少的媒介。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联动关系显示为地方社会生活逻辑的复归与重构,以及国家强行干预力的弱化与淡出。地方政府及其文化机构加强了对醒狮活动的引导和组织,相继建立和完善了曾被扰乱和中断的文体管理机构,重建了之前被解散的文体组织,醒狮文化活动不仅逐步恢复,还进入了形式、内容有所创新的发展状态。这要归因于“生产力发展取代政治性促动因素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风俗变迁最为直接、最具有基础性作用的促动力”<sup>[18]</sup>。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文化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醒狮的恢复,对醒狮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时国家对醒狮文化的介入,还没有激活地方民众对于传承、发展醒狮的文化自觉。进入90年代以后,国家对醒狮变迁的影响更为深刻,扮演着更加主动灵活的角色。国家大力推动舞狮活动的竞技化,并使之与国际接轨,凸显其国族象征价值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理路,实际上旨在通过发展醒狮运动获得政治、经济的多赢效果。这种利益诉求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政治利益是指执行国家意志的地方政府意识到,醒狮作为地方特色是彰显地方底蕴的文化符号,更是提升地方形象的文化资本;经济利益是指醒狮越来越具有开发文体、旅游产业的潜力,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突破点。醒狮集政治、经济资源价值于一体,让地方社会对醒狮的利用和开发更为主动。在这种情境中,执行国家意志的地方社会成为醒狮文化发展的主要规划者、动员者和宣传者,甚至主导了醒狮表演技艺和交往习俗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机构、政府文体部门、地方企业、新闻媒体等共同发挥了作用。

文化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社会生活最强有力的两个方面,即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不仅造成社会的变化,而且也源于社会的变化。”<sup>[19](P180)</sup>政治、经济关系是国家力量的集中体现,它们作用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转型期的佛山醒狮,促进了佛山醒狮变迁的进一步发生。科罗尼尔



(Fernando Coronil)在针对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的书评中也提出,不光要关注“国家怎样看”,也要关注“市场如何闻”。“闻”具有双重含义——要能闻出臭和香,还要能嗅出成功的产品、机会或者消费者的需求。在社会变迁中,一方面,由国家政治主导的力量自上而下地作用于佛山醒狮,带来了佛山醒狮的变迁;另一方面,非个人化的、匿名的地方社会的市场力量也在国家政策的刺激下集结,推动着佛山醒狮从形式到内容的变迁。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机制逐渐影响甚至支配佛山地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随着醒狮与市场相结合的醒狮文化产业的发展,地方社会对醒狮的影响逐渐深化,并成为佛山醒狮变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力量。市场经济催生了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这为个体和企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市场。对佛山醒狮而言,国家对文化产业开发的推动和地方政府对于国家政策的落实,不仅为醒狮的传承和变迁注入了动力,也为个人和企业投资发展以醒狮为内容的文化企业、产业创造了难得的条件和机遇。

醒狮的保护、利用和开发进入自觉发展期,这个阶段由国家和地方社会“合谋”推进,并与全球化发展的时势息息相关。英国人类学家布朗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指出:“我们很少发现一个社区与世隔绝,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在现代,社会关系网络已延及整个世界,但是任何地方的延续性又没有被完全中断。”<sup>[20](P216)</sup>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佛山醒狮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卷入全球化发展体系,这个过程是无法避免的。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市场经济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使农村的经济形态、人口结构与价值观念发生了鲜明变化,基层农村的醒狮传承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处于全球化语境下国家、地方社会等多种力量的共谋和协商之中,佛山醒狮由民众主体自我享用的生活文化转变为“他者”共享和大众消费的客体文化,成为彰显地方形象的文化名片和特色符号。

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带来了佛山醒狮的剧变和渐变。其剧变表现在,受外来、全新的认知观念的熏染,以及国家舞狮竞技的推动,醒狮从民间舞狮人的文化实践整体中分离出来,变身为“民族民间舞蹈”,并被进一步体育化、竞技化,甚至成为国家和市场联合开发的文化产业项目。而国家主导、地方社会响应的非遗保护运动的兴起,又重新凸显了佛山

醒狮的传统文化价值,一些本来渐已式微的传统采青套路成为地方积极挖掘的特色文化。国家与地方社会在此形成合力,促进了醒狮文化身份的回归与多元化扩张。对于醒狮文化的再发现和再认同,一方面将醒狮拉进文化“保护”序列,另一方面又变为国家、地方社会合力发展体育、旅游产业所征用的“文化资本”。醒狮的渐变则体现在醒狮艺术的形式变迁方面,其表演的戏剧和武术传统中渐渐渗入了南狮北舞和杂技化的因素,进而带来了所伴生的文化元素的变迁。佛山醒狮也在契合各方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发生了从艺术到技术、从民俗到体育、从交往到展演的变迁。

从地方社会视角来看,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佛山地方社会对于醒狮存续的作用,抑或是醒狮在佛山地方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依托于村落、武馆的醒狮传承组织趋于弱化,传统的醒狮套路逐渐式微,传统醒狮表演活动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醒狮渐成体育、竞技活动,从民俗场域进入竞技舞台,其技艺从戏剧化、武术化的表演转变为高难度的标准化、杂技化表演,其村落习俗也从内部交往变为以“文化+”为表征的公共展演,原本作为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醒狮与民众生活有所疏离。不管是国家主导的对醒狮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还是对醒狮文化的利用与开发,都离不开佛山地方社会这一文化基础和主要载体,离不开地方社会的参与和助推,地方社会也从醒狮文化的发展中收获了实惠。

国家和地方社会在佛山醒狮的传承与发展中地位不同,利益要求不同,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差异。其中,国家扮演着引导者、组织者、动员者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醒狮的遗产保护、资源开发对于国家而言,具有越来越凸显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地方社会作为文化产业的投资、经营和收益方,助推着佛山醒狮竞技的体系化、赛事的品牌化、遗产的资源化,而佛山醒狮广泛进入旅游景点(祖庙、西樵山)、报纸网站、电视电影等空间,甚至产生了为数不少的职业、半职业醒狮组织,是其最鲜明的表征。如此,地方社会作为佛山醒狮所依存的具体时空,渐渐在国家政治促动力的作用下丧失了传统而平静的状态,成为承载政策与产业的配合力量。总之,国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成为佛山醒狮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它既可运用暴力、威权抑制或弱化佛山醒狮,也可能利用醒狮文化服务于经济目的或政治治理,从而留给佛山醒狮得以复兴演变的一定的社会空间。

地方社会在国家在场的情况下,亦可与之互动、融合,将佛山醒狮转化为民族与国家的象征符号,从而使之获得合法性并产生积极的效果。

进而言之,国家对醒狮的遗产保护和产业开发,无法离开地方社会的协助与支持;地方社会对于醒狮的资源利用和产业开发,需要国家政策的肯定与助推,否则难以外现为具体的方案和项目;相比于国家依赖地方社会的稳定程度而言,地方社会在醒狮的传承和发展方面依赖国家的程度具有动态性,它从国家获得实惠和利益的多少,决定着其参与醒狮发展的程度高低。从根本上说,佛山醒狮的变迁状况,取决于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情况,二者的互动结果决定着佛山醒狮变迁的大方向。当然,在全球化、全球主义体系中,国家、地方社会作为全球的组成部分,两者不是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会随着国家地位的变化实现关系的互转,因为国家也是全球格局中的“地方”。如此,国家和地方社会的互动会更加密切,国家在佛山醒狮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地方社会对于佛山醒狮发展的基础、载体作用更加不可忽视。

#### 参考文献:

- [1]叶春生.岭南醒狮的风俗源流[J].民间文学论坛,1984(1).
- [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A].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4]饶纪乐.关于广东体育社会化问题的调查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1984(2).
- [5]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体育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 [6]陈晓丹.南狮发展的口述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D].广州体育学院,2012.
- [7]费孝通.乡土重建[M].长沙:岳麓书社,2012.
- [8]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海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9]佛山市南海区地方志办公室.南海市体育志:1979~2002[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
- [10]佛山市禅城区地方志办公室.佛山市城区志 1984~2002[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 [11]费孝通.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在“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 [12](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3]佛山市禅城区地方志办公室.佛山市石湾区志 1984~2002[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 [14]关宏.我语佛山[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 [15]穆昭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 [16]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J].文化遗产,2016(5).
- [17]彭兆荣.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表述与制造[J].文艺研究,2008(2).
- [18]侯松涛.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风俗变迁动力机制的转型[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2).
- [19](法)戈德利耶.社会人类学产生于西方,就离不开西方么[A].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人类学的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20](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潘蛟,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 yelirong@126.com

## A Probe into the Development and Motivity of Local Folk Cultur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aking the Foshan Lion Dance as an Example Xie Zhongyuan

(Lingnan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528000, Guangdong Province)

**Abstract:** Unlike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folk tradition tends to break down as a who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Foshan lion dance has adapted to social changes and founded a development path with sample significance. It is attributed to the revival of folk lion dance since the 1980s and its reconstruction from folklore to sports, which has further realized not only the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of lion danc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1990s, but also the cultural re-identification and linkage of lion dance in the contex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Relying on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oral interviews, the dynamic mechanism has been elaborat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ation or socie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law of local folk culture and that has provided a path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inheritance of lion dance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folk culture; Foshan lion dance; local society; dynamic mechanism